

抗戰初期華東淪陷區親日群體研究 ——以「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為中心的探討*

劉 潔**

摘 要

1937年底，華東地區相繼淪陷。日軍為減輕華東淪陷區的抗日情緒，鞏固統治，於1938年7月在上海成立大民會。大民會在鎮江的分支——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於1938年10月成立，1940年底解散。大民會在鎮江既籠絡了部分頭面人物主持會務，也拉攏了一部分中下層民眾成為會員。然而，前者徘徊於妥協合作與民族情感之間，態度模稜兩可；後者儘管為生計所迫而接受了日本當局的「救濟」，對親日宣傳卻消極抵制。降日民眾在忠奸與存亡之間的兩難抉擇，反映了抗戰初期淪陷區社會的複雜面相。

關鍵詞：親日群體、大民會、鎮江、淪陷區、抗日戰爭

* 編按：為節省篇幅起見，關於「日偽當局」、「偽政府」、「偽組織」、「偽職」……等類用詞，除史料引文或徵引資料外，均取消「偽」字。

收稿日期：2017年3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7年12月8日。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前 言

華東地區素為國民政府的核心統治區。華東淪陷後，日軍對華東的實際控制極為有限，在縣及縣以下的鄉村地區，仍有大量中國軍隊在進行抵抗。中華民國維新政府雖於 1938 年 3 月成立於南京，卻未能建立穩固的統治，至 1939 年夏，「各省設縣治者十之五六」。¹為增強對民眾的思想鉗制，以鞏固統治，日本當局於 1938 年 7 月在上海成立了一個類似華北新民會的組織——大民會。儘管大民會標榜自身為「純正的民眾團體」，但事實正如日本學者井上久士所言，大民會「絕對不能算是『純粹的民眾團體』」，而是「對民眾宣傳並謀略機關」及「軍謀略工作的支那側主體」。²如此，大民會的性質及用途便顯而易見了，即從事親日宣傳及少量民政工作，以收買人心，穩定日本統治。

目前，學界關於大民會的研究尚屬初步，對大民會地方運作的具體考察，更屬空白。從大民會人員構成的角度來研究淪陷區的親日群體，更是匱乏。此外，既有相關研究往往受制於二元道德對立的敘事框架，分析及立論均過於簡單化。³歷史是人的歷史，而人性是複雜的。淪陷區民眾面對謀生的生存困境，盡忠或妥協的道德兩難，其複雜性和多樣性有必要得到更多關注。本文無意為降日者翻案，也無意對其進行道德評價，僅致力於事實呈現。⁴鎮江是大民會

¹ 王鴻恩，〈大民會成立一週年之感想〉，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南京：大民會總本部，1939），頁 1。

² 井上久士，〈解說〉，收入氏編，《華中宣撫工作資料》（東京：不二出版，1989），頁 10。

³ 目前學界關於大民會的研究並不多，僅有少量專題論文，如邵雍，〈大民會的來龍去脈〉，《檔案與史學》，2003 年第 6 期，頁 51-54；劉潔，〈抗戰初期華東淪陷區偽組織大民會考論〉，《民國檔案》，2016 年第 4 期，頁 98-108。學者羅久蓉對抗戰時期的漢奸群體有過深入研究，見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下）（1995 年 6 月），頁 815-841。學者卜正民的專著中亦有專章介紹鎮江政權，惟對於鎮江大民會的情況則幾未涉及，見卜正民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110-147。筆者認為，對大民會組織本身及淪陷區親日群體的研究均有待深入。

⁴ 文中對「漢奸」、「淪陷區」等少數詞彙的沿用，不代表本文的價值立場，使用時一般亦不加引號。

會務推行最好的地區，本文即以「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以下均簡稱為「大民會鎮江聯部」）為切入點，利用大民會的會務資料、報刊、文史資料、人物著述及鎮江市檔案館檔案，通過考察大民會及自治會的領導人員、會務職員及普通會員等鎮江社會各階層的心態、行爲及彼此間的互動，呈現抗戰初期華東淪陷區民眾徘徊於忠與奸的道德兩難、生與死的生存困境的複雜面相。

一、鎮江淪陷及親日政權的建立

1937年11月中旬，昆山、蘇州相繼淪陷。消息傳到鎮江，人心惶惶，全城百姓奔忙搬家。然而，戰亂時期，逃難是富人的特權，窮人拖家帶口，沒有逃難的川資。當時的鎮江企業家張懌伯因留守工廠，故仍滯留鎮江，並將其親歷之淪陷情形書成《鎮江淪陷記》一書。據該書記載，11月27日及28日兩天，日軍飛機轟炸鎮江，居民連夜搬家：

其中財力充裕的，已遠至川、湘、武漢等處。中等人家，唯一去路，不是江北，便是洲上，非船不行。但在這時，只有「普濟」及「新鎮江」兩輪渡，夜間往來開行，裝兵為多，擁擠不堪，如非強有力者，絕難搶登上船。其餘江邊民船，全被有權力的強封。無船不能飛渡，肩挑負擔，扶老攜幼，整日夜坐在江邊等候，終於無船可渡，望江興歎，迫得又搬回者，很是不少。⁵

這些無力逃難的老弱病殘及貧苦民眾，只好坐守家中，閉戶不出。此時國民政府將要遷往武漢，並無死守鎮江的打算，鎮江地方官員均已逃亡。據張懌伯記載：

在大市口觀音樓一帶看見堆了一些沙袋，僅半人高，所裝並不是沙，乃係煤炭渣子。其中僅有幾隻麻袋，多數係用雜物裝盛，如煤油木箱、米店大籬之類，無非臨時雜湊。如照這樣簡陋工事，想來抵禦強敵，

⁵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7。

可以把它叫做滑稽工事。由此看來，已可明白鎮江之不預備抗戰。黨部人員，已早走了，只留下牆壁所貼「保衛鎮江」之標語及插畫而已。各機關長官，也陸續走了。江蘇省會若干萬眾，處於無政府狀態下了。官廳對民眾，已棄之如遺，死活存亡，只好你們各自打算了。⁶

由於國民政府在鎮江防務消極，12月8日，日軍輕而易舉進入鎮江城。關於日軍在鎮江姦淫擄掠之過程，已有很多記載，在此不一一贅述。據張懌伯的描述，全城「無家不破，無室不空，毀壞財物，不計其數，殺戮生命，無從統計。據聞紅萬〔卍〕字會收男女屍，共一千四五百具，其中女屍約占十分之一，遭禍之慘，無異洪水猛獸」。⁷除了直接死亡，戰爭還造成大量無家可歸的難民。日軍駐鎮江宣撫班班長加藤幸藏在1939年回顧道，日軍入侵鎮江之後，「傾家蕩產失業無法生活者約有2萬多人」。東西回教民教堂收容所、救濟院、醫政路難民所以及大照電氣公司難民收容所等7處收容所共收容難民1萬多人。⁸至次年2月，海軍陸戰隊難民收容所仍有603名難民，大照電氣公司收容所仍有難民476名，西回教民教堂收容所仍有難民712名，東回教民教堂收容所仍有難民1,021名，這四處加起來共有難民2,800餘人。民眾或死或傷，或避走他鄉，鎮江城區人口從戰前的20萬人銳減至2萬餘人。⁹

戰後鎮江千瘡百孔，日軍開始考慮搭建傀儡政權，以恢復社會秩序。早在1937年12月下旬，宣撫班就多方物色本地要人，希望他們出來組織維持會。¹⁰當時鎮江商會在本地很有影響，歷任會長都是商界頭面人物。從日軍的打算來看，若商會會長願意出來做事，利用商會原有的組織和影響力來組織維持會，

⁶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頁8-9。

⁷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頁39。

⁸ 加藤幸藏，〈從事宣撫工作之回顧（二）〉，《南京新報》，1939年7月3日，第2張第2版。

⁹ 〈資料18·鎮江班記錄〉，收入井上久土主編，《華中宣撫工作資料》，頁144。

¹⁰ 關於維持會、自治會和大民會的關係，在此稍作說明。維持會和自治會是占領初期日軍在各地成立的臨時性政權組織，但自治會較維持會更為正式，出現的時間也更晚。日軍占領一地後，先是成立維持會，俟宣撫班到達後，再將維持會改組為自治會。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於1938年3月成立後，各地的自治會陸續改稱縣公署。鎮江自治會於1938年8月改為縣公署。至於大民會，係專事親日宣傳的民眾教化組織，非政權組織。見卜正民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頁66-69、121、136。

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但戰前的鎮江商會會長陸小波、冷御秋等不願下水，早已逃離了鎮江。¹¹於是，宣撫班只好打二流人物的主意。據鎮江宣撫班給上海滿鐵事務所的報告，12月底，維持會班底本已確定，嗣後維持會成員顏觸以班底成員太過「貧弱」為由突然退出，並表示會內存在陰謀活動。宣撫班只好重新籌備人馬，打算直接成立相對正式的政權組織——「自治委員會」。¹²當時，鎮江只有一個叫徐恆發的人會說日語，此人受雇於鎮江大照電氣公司任日語翻譯。宣撫班遂通過徐恆發拉攏大照公司經理郭志成，要郭擔任職務。郭畏懼漢奸的名聲，只肯在幕後活動。又因「鎮江人民公推柳肇慶氏為委員長」，這樣，由北洋舊官僚柳衍齋（即柳肇慶）任委員長、郭志成副之的鎮江自治委員會便於1938年1月10日成立。自治委員會除正副委員長之外，還有顧問3人，並設總務、行政、司法、教育、財政等機構。幾個月後，由於柳衍齋並不十分配合日本人，對於被挾持的傀儡生活也感厭倦，遂在5月辭職，由副委員長郭志成繼任委員長。8月1日，鎮江自治委員會正式改組為丹徒縣公署，郭志成由宣撫班班長加藤幸藏繼續保薦為縣知事，直至汪政權「清鄉」才下臺。¹³

這個倉促搭建的政權並不能讓日本人滿意，尤其在思想工作方面。宣撫班長加藤就說，「一般頭腦不清楚、智識簡單的人民，他們因為受了過去黨方錯誤的宣傳所麻醉，對於中日必然地合作而求共存共榮之道，尙未能至於瞭解，故還有厭惡與仇恨的心理」。¹⁴為了「糾正」鎮江民眾的「錯誤思想」，日本

¹¹ 鎮江淪陷前夕，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讓鎮江縣縣長張清源說服冷御秋以商會會長名義，借助商團武裝，組織一個委員會，在政府撤退之後維持鎮江秩序，被冷拒絕。嗣後張清源又找商會會長陸小波，陸亦不想背上漢奸罵名，說：「我們商會、商團維持地方秩序，日本也不會難為我們的，但我不成了漢奸維持會了嗎？我以後分辨是陳主席、張縣長命令我這樣做的，我口說無憑，分辨不清啊，一定要給我一個證明」。然而陳果夫不願以省政府名義出具證明，只以其個人名義給鎮江縣政府一個快郵代電，語意含糊。陸擔心以後「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故拒絕了陳，脫身去了蘇北。參見楊方益，〈鎮江商會始末〉，鎮江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鎮江文史資料》，輯6（1983），頁22。

¹² 〈資料18·鎮江班記錄〉，收入井上久士主編，《華中宣撫工作資料》，頁138。

¹³ 加藤幸藏，〈從事宣撫工作之回顧（二）〉，《南京新報》，1939年7月3日，第2張第2版。

¹⁴ 加藤幸藏，〈從事宣撫工作之回顧（一）〉，《南京新報》，1939年7月2日，第2張第2版。

當局決心加強親日宣傳。於是，當大民會於 1938 年 9 月派人來鎮江籌設支部時，宣撫班長加藤及縣知事郭志成均「當允竭力協助，務使早日成立」。¹⁵

經過一番籌備，10 月 1 日，大民會鎮江聯部正式成立。支部長胡克之原係鎮江自治委員會顧問兼總務處長，這年 4 月因對自治會不滿而辭職，此番由縣知事郭志成薦任支部長。據加藤回憶，胡「自辦事以來，異常努力，如舉辦物證借貸所，運銷合作社等，以促進救濟事業的發展」。¹⁶鎮江聯部亦被大民會總本部長高朔稱讚為「尤得當地特務機關的援助，頗能推行會務」。¹⁷大民會鎮江聯部存續到 1940 年底才宣布解散，前後在鎮江活動兩年時間。

二、忠與奸：大民會及自治會的領導人員

戰時擔任鎮江大民會或自治會領導職務的不外兩類人，一為退隱士紳，如柳衍齋、胡克之等人；一為商界聞人，如郭志成。這些人戰前在地方有些聲望，戰時也有一定的保護地方安靖的意願。例如，自治會委員長柳衍齋於清末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高等警察學校，1918 至 1920 年任江蘇省參議院議員，活躍於民初南京法律界。¹⁸據鎮江首任宣撫班長中山告訴其繼任者加藤幸藏，當初之所以讓柳出任委員長，係出自鎮江人民的公意。可見，柳在鎮江本地的口碑不壞。柳就職前，對日方提出的第一條要求就是禁止姦淫擄掠。¹⁹像柳這樣傾向保護地方的人，做事未必能讓日本人滿意。三四個月後，柳就辭職了，日本人便讓郭志成繼任其職。郭志成早年出身行伍，畢業於北京講武學堂，曾在柏文蔚部下任少將師長，後又任段祺瑞侍從室武官（少將）。1926 年，段祺瑞下臺，郭回到鎮江，擔任其叔父郭鴻儀所創辦的大照電氣公司經理一職。²⁰據

¹⁵ 〈一年來視察工作之彙述〉，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頁 3。

¹⁶ 加藤幸藏，〈從事宜撫工作之回顧（一）〉，《南京新報》，1939 年 7 月 2 日，第 2 張第 2 版。

¹⁷ 高朔，〈大民會成立一年來之感想〉，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頁 2。

¹⁸ 〈資料 18·鎮江班記錄〉，收入井上久士主編，《華中宣撫工作資料》，頁 139。

¹⁹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頁 44。

²⁰ 大照電氣公司由郭鴻儀創辦於 1904 年，初衷是為「自固利權」，抵制鎮江英商的勢力，係江蘇省第一家民營電力公司。王樹槐先生的研究認為，郭志成對於大照公司的發展，「是一個關鍵

《鎮江大照電氣公司創業三十周年紀念特刊》所載，郭任內「對於工程業務經濟，悉本科學管理之原則，積極改良」，對於推動該公司的發展起了關鍵性作用。此外，郭還於 1928 年參與對鎮江英租界當局的交涉，收回了租界的電氣營業權。²¹鎮江淪陷之初，郭尚未加入親日政權，鑒於無家可歸的難民甚多，便自掏腰包在其公司內成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數百人。至 1938 年 2 月，雖已疏散了部分難民，該收容所仍有難民 476 人。²²

像郭志成這樣複雜矛盾的另一個典型代表是大民會鎮江聯部部長胡克之。根據筆者查閱的史料，早在戰前，胡克之在江南多縣已頗有政聲。胡係貴州獨山人，前清拔貢，「戊戌廷試第三。榜名為和，以知縣分浙江」，²³歷任太平、高郵、金壇、丹陽等縣知事。1924 年，胡辭官歸隱，以整理國學為志，著有《四書端目》、《堅廠詩文集》等。近代教育家、南開學校創始人之一的嚴範孫在清末曾任貴州學政，與胡有師徒之誼，稱讚胡為「安靜之吏」。嚴範孫之子嚴智怡曾提及武昌起義時，各地驅逐前清官員者，所在多有，而時任太平縣知事的胡克之卻被該縣士紳挽留連任 5 個月，語間對胡頗為褒揚。²⁴

從太平知事任上卸任之後，胡曾於 1914 年至 1918 年、1924 年兩度任丹陽縣知縣，任期內做了不少事情。1915 年，胡克之在丹陽主持建成占地 20 畝的現代化公園。公園內有面積 4,000 平方餘尺的公共體育場，設有網球、排球、籃球、跳高、跳遠等場地，這在民初來說，確是開風氣之先。胡還在公園內興建了一座西式大樓。樓下是演講廳，可容納 500 餘人。樓上則是現代化的博物館，陳設著各種動植物標本和掛圖，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當時，「縣師、縣中

性的人物」。參見王樹槐，〈江蘇省第一家民營電氣事業——鎮江大照電氣公司（1904-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下）（1995 年 6 月），頁 523-526。

²¹ 《鎮江大照電氣公司創業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33 年），鎮江市檔案館藏，檔號 C039-1950-002-0006-0001。

²² 〈資料 18·鎮江班記錄〉，收入井上久士主編，《華中宣撫工作資料》，頁 144。

²³ 張忠惠，〈胡部長小志〉，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年紀念特刊》（鎮江：鎮江聯合支部，1939），無頁碼。

²⁴ 嚴智怡，〈嚴序〉，胡為和，《新輯四書端目讀本》（鎮江：青雲門讀書樓，1934），頁 1-2。

師生，常集體列隊前來參觀，以廣學識」。據時人回憶，「公園中每天遊人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成爲人們喜愛的場所」。²⁵

除興建現代化的公園，胡克之在丹陽任內還主持修撰《丹陽縣續志》和《丹陽縣志補遺》。湖桑亦經胡引入丹陽並加以推廣。1916年，胡在丹陽建立約30畝的蠶桑試驗場，推廣栽種湖桑和科學育蠶，聘用湖州工人管理桑園，並指導桑戶栽培湖桑，使得丹陽的桑蠶產量大增。此外，丹陽的新式教育在胡任內亦有較大發展。據1918年《教育公報》所載，胡克之在丹陽「增設高等小學校三所、國民學校二十餘所，增加學生數二千六百餘人」，「辦學卓著成績」，被北洋政府教育部授予二等獎章。²⁶對此，當地百姓認爲：「在整個民國時期，來丹陽作知縣與縣長的不下三十餘人，但對發展丹陽的建設事業來說，胡應列於首位」。²⁷

那麼，胡克之、郭志成等一班戰前口碑較好的地方精英，爲何會選擇親日？這就需要回到鎮江的歷史情境中，檢視複雜而又曖昧的多重因素。

首先，有些國人對抗戰的前景極度悲觀，認爲中國必敗，日本必勝，胡克之便是其中之一。七七事變甫爆發，戰火尙未延及江浙，胡克之就認爲「以新造未成之國，與久經強盛之國戰，自取敗亡，理也」。及至淞滬抗戰開始，江浙淪陷，胡更加相信自己最初預言之正確，益信中國必敗。鎮江淪陷後，在認定中國必敗的前提下，胡認爲其加入維持會是「詢悉劫後鎮江焚殺慘狀，毅然以救民水火爲己任」。²⁸

其二，士紳出身的漢奸，往往懷有地方責任感。當外敵入侵，在究竟是爲國盡忠，保持氣節，抑或是爲地方做事，保護地方父老之間，一些人選擇後者

²⁵ 韓連綬、徐蔚如，〈丹陽原公園公共體育場簡介〉，丹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丹陽文史資料》，輯4（1985），頁115-119。

²⁶ 〈呈大總統呈明給予江蘇丹陽縣知事胡爲和獎章文並指令〉（1918年1月16日），《教育公報》，卷5期4（1918），頁58。

²⁷ 吉宗伯，〈兩度擔任丹陽知縣的胡爲和〉，丹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丹陽文史資料》，輯6（1988），頁87-88。

²⁸ 張忠惠，〈胡部長小志〉，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無頁碼。

而加入了親日政權。例如，胡克之目睹鎮江滿目瘡痍，遂「睹狀不忍，毅然以救民爲己任」，²⁹加入自治會。胡曾對其親日之動機如是辯解：

言寡尤，行寡悔。平生竊自慎修，時懼未逮，中日事變後，刳餘軀殼尚存，既不能無言，又不能無行，尤悔之來，愈不能免。然若尤悔之是懼，而一言不敢發，一事不敢行，是軀殼未死，而心已先死。予雖不敏，亦不願出此。顧亭林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今則禍患迫切，衰邁殘齡，死而復生，尚何畏懼……憑此良知，不避嫌怨，不計功利，但盡勸導之責，藉明挽救之誠。事實俱在，聊表此心，知我罪我，待諸後世。³⁰

這段話透露了兩層意思，一方面，胡克之承認加入自治會和大民會終是人生汙點，終有後悔之日，所謂「尤悔之來，愈不能免」。另一方面，胡克之又強調，當地方殘破之際，倘若爲了個人名節而袖手旁觀，這和死了有什麼區別呢？所謂「然若尤悔之是懼，而一言不敢發，一事不敢行，是軀殼未死，而心已先死」是也。胡還表示，自己「衰邁殘齡，死而復生，尚何畏懼」，這便是說明知會被罵作漢奸，亦在所不惜。胡是讀書人出身，或多或少受到忠孝節義思想的影響。他一再強調「知我罪我，待諸後世」，甚至專門寫了題爲〈什麼叫漢奸〉的文章以自解，恰恰說明他非常介意漢奸的名聲。³¹

淪陷期間像胡克之這樣內心矛盾的漢奸，還有很多。據張懌伯的記載，自治會委員長柳衍齋亦深陷矛盾之中，既想爲地方做事，又不甘心當漢奸。張懌伯曾親眼目睹柳「到醫政學院難民收容所，召集難民演說時，嚎啕大哭著說，我（柳自稱）是爲了你們（指難民）出來」。張認爲柳擔任該職，「推其用心，自亦抱有救民水火志願」。張還記載，「我親目所睹，柳乘包車出外，一人前導，手執日旗，觀此種種，已被無形管制，失卻自主，要爲環境所迫，論情猶

²⁹ 〈編者弁言〉，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鎮江：中國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1940），頁1。

³⁰ 胡克之，〈自序〉，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頁2。

³¹ 胡克之，〈自序〉，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頁2。

有可原」。張懌伯認為自治會後來之魚肉敲詐、為害地方之事，「當非柳初願，而現則陷入泥淖中，不復能自拔矣」，語間對柳不乏同情。³²張懌伯寫《鎮江淪陷記》的初衷原是為喚醒國人的愛國意識，鼓舞抗戰士氣，故書中對於漢奸行徑極為不齒。考慮到該書用意，其對柳衍齋之親日行為，當無為其文過飾非之必要，記述應屬可靠。

其三，戰時日軍對「大亞洲主義」的宣傳，也間接助長了親日行為的發生。為使戰爭合法化，日本竭力鼓吹中日同文同種，強調兩國應攜手行動，用東方文化道德取代西洋文化，以振興亞洲。由於部分中國人對於文化上更為接近的日本，較之對歐美更有認同感，上述宣傳便得到了他們的回應。學者入江昭的研究表明，在 1938 年至 1940 年間，大亞洲主義思想影響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³³以胡克之為例，胡在戰前的 1934 年曾出版了一本名為《四書端目》的書，稱「本書以整理國學，發揚固有道德智識為宗旨」。該書〈自序〉稱：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歐風東漸，文化日新。莘莘學子，爭尚物資，鮮重躬行……國學日乏精研，道德淪胥，智識短淺。國本既撥，能力愈微，以此競存世界，期臻大同，揠苗助長，得不槁乎？……有心世道者，果能推行本書，俾人各見諸實踐，則本固邦甯，繁昌民族。³⁴

可見，早在戰前，胡已有感於歐風東漸，人心不古，素有倡導國學之念。及至戰時日本大力鼓吹「大亞洲主義」思想，而大民會亦宣稱其綱領「民德主義」旨在「使中國固有的東方精神發揚光大起來」³⁵，這正暗合了胡素有的想法。在胡看來，任職於大民會是「為保全中國固有的道德，集合品端學粹，事理明達的人士，互相努力，重來整興文教，期與同胞實踐民德，挽救中國，共

³²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頁 44。

³³ Akira Iriye,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69.

³⁴ 胡為和，〈緒言〉，《新輯四書端目讀本》，頁 1-3。

³⁵ 大民會出版部編，《大民會的任務》（南京：大民會總本部，1938），頁 2。

保亞洲，不至為白種人所欺侮」。³⁶由此觀之，個人原有的思想傾向一旦受到戰時政治宣傳的鼓動，便易於從思想走向行為，胡克之就是一個典型。

最後，保護私有財產免受戰禍侵害，這對商人出身的漢奸來說，是一個相當實際的考慮。例如抗戰初期擔任鎮江商會會長的曹朴安，原是和興號煤業的老闆，戰前當過商會執行委員。據時人分析，其「下水」的原因，一是為了保全和興號煤號及其私人財產；二是見商界同行郭志成已經當了縣長，比較之下，商會僅是民眾團體，商會會長算不得漢奸，就心安理得地做了會長。³⁷這兩個原因中，前者相對容易理解，後者多少有些「五十步笑百步」。

鎮江普通百姓對於地方上層人士的親日行為，心態複雜，既恨其「為虎作倀」，同時又私心竊喜。據張懌伯的記載，淪陷初期，鎮江百姓經歷了一個多月的燒殺劫掠，人心惶惶，此時柳衍齋出任維持會長，百姓「覺得到此時候，才算地方有主，群情稍覺安慰」。³⁸這大概是當時民眾的普遍心態，即經歷了恐怖時期之後，心理極度脆弱，這時忽有一知根知底的本地人出來主政，自然持歡迎態度。類似的心態描述見於鎮江人楊方益的憶述資料中。據他回憶，「清鄉」之後，日方請青幫首領邱鳳儀和商人藍學華出任要職，各界人士對此的觀感如下：

這時淪陷已有五六年，善良的市民們在日偽壓榨下苟延殘喘，而且隨時有橫禍飛來的可能。但禍到臨頭，總得想一個解決的路子。邱鳳儀在鎮江多年，拉攏了許多朋友；特別是藍學華，他是本地人，熟人極多，萬一遇有意外，可以直接找這兩人走路子。事實也正是這樣，殷實居民和商界人物，往往突然被戴上一頂帽子而被捕，也常常找上「商會」，要「會長」藍學華說項。

³⁶ 胡克之，〈什麼叫漢奸〉，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頁 27-28。

³⁷ 楊方益，〈鎮江商會始末〉，鎮江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鎮江文史資料》，輯 6，頁 23-24。

³⁸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頁 44。

對百姓的這種心態，楊方益認為，「這並不是心理的變態，更不是甘心擁護日偽，而是有其痛苦的隱衷」。³⁹這隱衷便是生存問題。淪陷後的鎮江失去了本國政府的保護，民眾生活較之戰前，更形艱難。對這些在日本統治下艱難求生的淪陷區百姓而言，有本國人在親日政權中做事，消解一部分來自日本人的壓力，好過於日本人的直接統治。

日軍占領鎮江後，為便利其統治，最便捷的方法是與地方士紳合作，即請鎮江政、商兩界要人加入自治會或大民會。士紳或出於對抗戰前景的悲觀，或為保全地方，或因受日軍宣傳之鼓動而選擇了降日。亦有為保護個人財產而選擇合作之商人，以商會僅係民間團體，不能與親日政權等量齊觀來自欺欺人。淪陷時期鎮江的歷史情境複雜多變，地方上層人士降日行為的發生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難以歸因於任何單一因素。

三、存與亡：大民會會務職員及普通會員

芸芸眾生是歷史的重要參與者。普通民眾存世的資料有限，故以往的歷史書寫中往往缺少其身影。由於大民會的職員和會員多由「升斗小民」組成，下文將以這一群體作為切入點，藉此考察淪陷區下層民眾生活之實態。

表 1 大民會鎮江聯部全體職員履歷

| 職別 | 姓名 | 籍貫 | 年齡 | 經歷 |
|------------|-----|-----------|----|--|
| 支部長（兼組織科長） | 胡克之 | 江蘇鎮江，原籍貴州 | 65 | 前清拔貢，歷任浙江太平、江蘇丹陽、金壇等縣知事，鎮江自治委員會總務處處長，自治委員會丹徒縣公署縣政諮詢會會員 |
| 總務科長 | 胡筠 | 江蘇丹徒 | 58 | 前清國立南京高等學校最優等畢業，曾任揚中縣第三科長、江蘇建設廳科員 |
| 科員 | 陳子寬 | 江蘇丹徒 | 58 | 前清附生，歷充丹徒縣公署各科科員 |
| 科員 | 張忠惠 | 江蘇鎮江 | 28 | 上海亞光郵務海關專門學校畢業，曾充江都、鎮江地方法院候補書記官 |

³⁹ 楊方益，〈鎮江商會始末〉，鎮江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鎮江文史資料》，輯 6，頁 25。

| 職別 | 姓名 | 籍貫 | 年齡 | 經歷 |
|---------|-----|------|----|---|
| 科員 | 謝彬森 | 江蘇鎮江 | 37 | 河北省財政廳一等辦事員 |
| 辦事員 | 韓子春 | 江蘇鎮江 | 39 | 江蘇省農民銀行出納助理員 |
| 辦事員 | 李漢臣 | 江蘇鎮江 | 25 | 江蘇省立南京中學畢業，鎮江縣書記兼一等辦事員 |
| 辦事員 | 石慶麟 | 江蘇鎮江 | 27 | 日文日語講習所甲級肄業，教育局辦事員 |
| 辦事員 | 周西庠 | 江蘇鎮江 | 45 | 南京警務學校畢業，江蘇建設廳事務員 |
| 日語講師 | 岸文貞 | 日本 | 31 | 東京大學 |
| 日語講師 | 謝世堃 | 日本 | 24 | 臺灣工業專門畢業 |
| 日語講師 | 洪德旦 | 江蘇鎮江 | 28 | 日本和歌山市青年學校，曾在日本經商多年 |
| 日語講師 | 徐恆發 | 江蘇鎮江 | 38 | 曾在日本經商 18 年 |
| 日語講師 | 鮑慶和 | 江蘇淮陰 | 22 | 清江工業專門學校畢業，曾任鎮江郵局通譯 |
| 國學講師 | 陳必達 | 江蘇鎮江 | 55 | 優貢，法政畢業，歷任武進、太倉縣署科員，常德第二科長，前鎮江自治委員會審判官 |
| 主任科員 | 葉子丹 | 浙江鄞縣 | 39 | 全浙旅鎮同鄉會會務主任，磷寸工廠總務科科長 |
| 科員 | 尹逸民 | 江蘇鎮江 | 45 | 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畢業，鎮江自治委員會民政科一等科員，丹徒縣公署教育科辦事員 |
| 科員 | 王由先 | 江西吉安 | 25 | 江蘇省立第六師範畢業，全浙旅鎮同鄉會文書 |
| 辦事員 | 劉焯 | 江蘇鎮江 | 25 | 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專門學校機械科畢業，歷任吳縣縣政府一等辦事員，蘇州電汽製圖員 |
| 辦事員 | 邵春萱 | 貴州 | 55 | 法政畢業，歷任軍政各界事 20 餘年 |
| 書記 | 陸庸軒 | 江蘇鎮江 | 27 | 曾充綢業統計員 |
| 書記 | 柳肇霖 | 江蘇鎮江 | 39 | 鎮江縣塘工委員會職員 |
| 宣傳科科長 | 李觀雲 | 江蘇鎮江 | 49 | 鎮江中學，南京圖書館編校 |
| 主任科員 | 晉義鑑 | 江蘇鎮江 | 29 | 鎮江自治委員會編審股股員 |
| 科員 | 童寅 | 江蘇鎮江 | 25 | 曾任報界記者編輯暨小學教員 |
| 宣傳隊第一隊長 | 王甦 | 江蘇鎮江 | 29 | 歷任轉運公司及報關行會計 |
| 宣傳隊第二隊長 | 王熙圃 | 江蘇鎮江 | 36 | 前淮南緝私稽核所督察，鎮江西部渡河檢查所主任 |
| 辦事員 | 石念祖 | 江蘇鎮江 | 26 | 歷任小學教員 |
| 辦事員 | 尹聖千 | 江蘇鎮江 | 23 | 曾任南京市立盲啞學校打字員、書記等職 |
| 辦事員 | 張伯雨 | 江蘇揚州 | 45 | 南京甯屬師範畢業，上海美術專科畢業，曾充江都農村學校校長、泰興縣公安局局長、如皋公安局二科科員 |
| 書記 | 王仲衡 | 江蘇鎮江 | 24 | 南京鍾南高中畢業，前縣立蝗王廟初級小學校長、鎮江縣政府辦事員、模範小學教員等職 |
| 書記 | 吳樂君 | 江蘇鎮江 | 25 | 金融界國外匯兌員、鎮江自治會總務文書辦事員，丹徒縣公署服務員 |

資料來源：〈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全體職員姓名經歷一覽表〉，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頁3-6。

表 1 是大民會鎮江聯部全體職員履歷表。鎮江聯部共有職員 32 人，除 2 位日籍職員外，其餘多為鎮江本地人或來自周邊地區。表中的兩位日本人均任教於大民會所辦的日語學社，其中 1 位名謝世堃，並非日本人，實是臺灣人。觀其履歷可知，這些人多為中學或中等專科學歷，鮮有大學學歷。他們在戰前多為縣署科員、辦事員、中小學教員等中下層公教人員。戰爭一爆發，這些人大多沒有逃難的川資，只好留在鎮江謀生。為此，他們在大民會任職，每月領取 5 元至 16 元不等的微薄薪水。⁴⁰張懌伯曾對這些在淪陷區艱難求職的人有如是描述，「現在失業的人太多，開一學校，謀教員的不可勝數。偽綏靖隊招兵，偽警察局招警士，來投效的車載斗量。大家爲了飯碗，靦顏事仇，毫不爲恥」。⁴¹張所謂的「爲了飯碗，靦顏事仇」的論調，雖有道理，卻未免沒充分考慮普通民眾生存的壓力。張本人係企業家，衣食無憂，要講大義相對容易。可對於芸芸小民來說，失去這份職位，也許就找不到其他工作，意味著餓死。生存永遠是他們首要的問題。

對職員來說，大民會是糊口的飯碗。對普通會員而言，加入大民會則並無太多實際好處。因此，會員徵集工作相對困難。然而，大民會總本部爲擴大大民會作爲民眾組織的影響，規定「純以吸收會員之多寡以定工作成績之優劣」，鼓勵各支部擴充會員。⁴²於是，鎮江聯部便想方設法徵集會員。例如，根據會章，會員分爲普通會員和基本會員兩類，基本會員須每年繳納會費，但享有會務參議權，普通會員則無此權。民眾若欲入會爲普通會員，必須有至少一位基本會員爲之介紹方可。有鑑於此，鎮江聯部變通辦法，規定普通會員也可介紹民眾入會。儘管想盡辦法拉人入會，鎮江的會員人數卻並不理想。1938 年 11 月，大民會鎮江聯部成立 1 個月時，會員數爲 200 人。⁴³次年 3 月，共有會員

⁴⁰ 曹霄先，〈金壇支部周年概況〉，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頁 43。

⁴¹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頁 54。

⁴² 〈大民會總部及上海市聯合支部關於徵集會員、頒發會證的訓令〉，上海市浦東新區檔案館藏，檔號 35-1-003。

⁴³ 〈大民會鎮江支部繼續徵求會員〉，《南京新報》，1938 年 11 月 29 日，第 2 版。

334 人，⁴⁴5 月，會員數為 443 人。⁴⁵至 1940 年 4 月，會員數為 984 人。⁴⁶可見，會員人數在當地總人口中所占比重較低。⁴⁷這說明成為大民會的會員，對民眾的吸引力不大。

表 2 鎮江各縣大民會會員職業

| 職業 | 百分比 | | |
|----|--------|-------|-------|
| | 鎮江聯合支部 | 丹陽支部 | 金壇支部 |
| 商 | 32% | 28.8% | 25.7% |
| 政 | 30% | 26% | 23% |
| 軍警 | 15% | 7.1% | 15.2% |
| 學 | 9.5% | 22.4% | 15.7% |
| 工 | 5.5% | 15.7% | 8.4% |
| 農 | 3.25% | 0% | 6.8% |
| 失業 | 3% | | |
| 新聞 | 0.8% | | 2.6% |
| 法律 | 0.7% | | |
| 婦女 | 0.25% | | |
| 醫 | | | 2.6% |
| 人數 | — | 312 | 191 |

資料來源：〈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會員職業分類百分比圖〉、〈丹陽支部逐月徵求會員統計表〉、〈金壇支部周年概況〉，收入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頁17、頁41-42。該資料中，關於鎮江聯部的會員，僅有其職業構成的百分比數字，卻沒有會員人數的準確數字，故人數一欄空缺。

實際上，哪怕這些有限的會員，其入會亦非自願，多係集體強制入會。這一情形也體現在大民會會員職業構成中。表 2 是大民會鎮江聯部以及鎮江所轄之丹陽、金壇二縣支部之會員職業表。由表 2 可見，鎮江聯部會員以商人為主，

⁴⁴ 〈總本部工作報告〉，《大民會報》，期 3（1939 年 3 月），頁 11。

⁴⁵ 〈一年來視察工作之彙述〉，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頁 9。

⁴⁶ 〈大民會鎮江聯支部發表上月工作概況〉，《新鎮報》，1940 年 4 月 4 日，新聞版。

⁴⁷ 據加藤幸藏，〈從事宣撫工作之回顧（一）〉，《南京新報》，1939 年 7 月 2 日，第 2 張第 2 版記載，大約在 1939 年 5、6 月時，鎮江城區人口已由淪陷初期的 2 萬人增至 12 萬人，同一時期大民會會員人數為 443 人（由後文分析可知，其中絕大部分亦為城鎮會員），據此可推算會員人數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約為 0.37%。

其下依次為政界、警界、學界、工界會員。丹陽支部和金壇支部的情況亦類似，均以商人構成會員主體，其次為政、警、學、工界。出現這一情況，與大民會徵求會員的方式有關。首先，鎮江商業繁榮，商人眾多，大民會經常通過同業公會號召商人加入大民會，故商人會員最多。其次，該會往往強制政府公職人員集體入會，如丹陽支部就明令「丹徒區公所區長各坊坊長及各鄉公所主任，得為當然會員」，故政界會員亦多。⁴⁸由於大民會經常去函學校，要求師生集體入會，故學界會員也為數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表 2 顯示，鎮江的工人會員在總會員中僅占 5.5%，落後於商、政、軍警及學界會員數。較之丹陽和金壇，鎮江的工人會員比例也較低。而同時期的大民會總部會員職業統計資料顯示，工人會員占總會員數的 13.6%，僅次於商界和政界。⁴⁹也就是說，鎮江的工人會員比例，無論是與所轄的丹陽、金壇相比，還是與總部的資料相比，均相對較低。而實際上，為發展工人會員，大民會鎮江聯部曾於 1939 年 6 月聯合日清公司、日本通運、上海內河汽船公司等各企業，組設勞動工會，要求鎮江碼頭工人從 6 月 1 日起開始登記加入勞動工會，以 1 個月為限，並稱「倘逾期不來申請登記者，本會即以放棄權利論，嗣後本埠各碼頭不許參加何等工作」。但工人對於加入大民會勞動工會並不熱心，以致 1 個月的期限過後，仍有許多工人沒有登記。⁵⁰造成鎮江工人較少加入大民會的原因是，鎮江是長江下游重要的水陸碼頭，青紅幫勢力歷來強大。抗戰期間，日本人為籠絡幫會勢力，在南京扶持青幫首領常玉清成立安清同盟會，嗣後在鎮江成立分會，以鎮江青幫首領邱逢宜為會長。據鎮江人回憶，「幫會普遍滲入下層社會，在勞動人民中頗有發展；特別是在江邊碼頭及車站方面的輪船、民船工人、挑抬搬運工人以及人力車夫等當中，發展得相當普遍……他們投師的目的，僅是為了憑這個關係保全飯碗，減少別人

⁴⁸ 〈大民會各聯合支部工作報告〉，《新中國》，卷 1 期 4（1938 年 11 月），頁 61。

⁴⁹ 〈大民會會員職業分類百分比圖〉，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無頁碼。

⁵⁰ 〈鎮江勞動公會通告〉，《新鎮報》，1939 年 7 月 4 日，第 1 版。

的欺侮、壓榨」。⁵¹顯然，儘管大民會與青幫組織安清同盟會同以日本人為後臺，但其在鎮江下層社會的淵源和根基遠不如後者。對下層勞工來說，加入安清同盟會或許更實用。這是鎮江大民會的工人會員相比別地為少的原因。這也從側面說明，相較於中上階層，戰時普通民眾加入某一組織多是出於實際利益的考慮。

此外，表 2 中的農民會員也非常少，原因在於淪陷初期維新政府的統治觸角未及深入農村，鎮江僅「城市安靖，而四鄉混亂如故」，丹陽亦「城內尚稱安靖，四鄉則均有匪蹤」。⁵²於是，大民會的組織也未能到達鄉村，農民會員自然較少。至於新聞、法律這樣的現代職業，本身從業人數就少，會員就更少了。

大民會的普通職員與會員多為淪陷區無權無財的中下層民眾，這些人入會多出於實際生存的需要，與信仰無關。鎮江宣撫班長加藤幸藏曾談到一個現象，即日本人下鄉提供免費施診，鎮江民眾卻認為「這是日本人下鄉來賣鴉片給鄉民，毒化中國人，注射嗎啡針，來害中國人」。加藤為此憤憤地說，「不能互信，就根本談不到互助了」。⁵³由此可見，儘管表面上鎮江民眾服膺於占領當局的統治，但迫於生存壓力的妥協遠不意味著精神層面的認同。宣撫班長加藤在離開鎮江以後，也不得不承認：「『親善』、『提攜』、『合作』雖然是處處都可以聽到的名詞……但就目前的情形看，到達目標的距離是相差很遠」。⁵⁴

⁵¹ 楊方益，〈鎮江幫會見聞〉，鎮江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鎮江文史資料》，輯 8（1984），頁 67。

⁵² 〈一年來視察工作之彙述〉，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頁 9-10。

⁵³ 加藤幸藏，〈從事宣撫工作之回顧（一）〉，《南京新報》，1939 年 7 月 2 日，第 2 張第 2 版。

⁵⁴ 加藤幸藏，〈從事宣撫工作之回顧（一）〉，《南京新報》，1939 年 7 月 2 日，第 2 張第 2 版。

四、日常：漢奸的活動與民眾的反應

大民會支部長胡克之等一般戰前口碑較好的地方上層，其親日之後的所作所為究係謀取私利，還是像他們自己所辯解的那樣，是保全地方？同時，以大民會職員及普通會員為代表的鎮江中下層民眾對這些漢奸首領所作所為的觀感及反應又是如何？漢奸所代表的日方當局的實際作為與普通民眾對此的反應，共同構成了淪陷時期鎮江社會的日常面貌。本節將以大民會鎮江聯部為切入點，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作為一個輔助政府的民眾組織，大民會的主要職能是從事親日宣傳，並開展一些民政工作，以收買人心，減輕民眾的抗日情緒。由於得自大民會總部的經費非常有限，各支部的實際工作就是宣傳，民政事務迫於經濟原因而極少開展。⁵⁵對此，大民會鎮江聯部部长胡克之曾在鎮江會員大會上說，「人民只知大民會，專是文字口頭宣傳工作，而不知大民會，是人民團體，應做的事業甚多」。⁵⁶在胡看來，大民會不應自足於日方的御用宣傳機關，如喊喊口號，發發傳單等，而應該從事一些實際事務。

然而，辦事需要經費，經費從哪兒來呢？大民會總部每月發給各支部的經費僅 500 元，可謂杯水車薪，金壇支部就曾抱怨經費「入不敷出，辦事極感困難」。⁵⁷為尋求財源，胡克之多方討好鎮江宣撫班。胡在任鎮江自治會總務處長時，就曾提議開辦日語講習所，由宣撫班的日本職員教自治會的中國職員日語，後因故擱置。大民會成立之後，胡再次倡議開辦日語學社。1939 年 1 月，日語學社正式成立。儘管成績不佳，最終只有不到 1/6 的人結業，但胡卻通過此舉獲得了鎮江宣撫班班員小島的信任。事實上，胡克之與小島往還甚多，胡

⁵⁵ 關於大民會支部的經費運作情形，筆者曾對此進行過專門研究。見劉潔，〈抗戰初期華東淪陷區偽組織大民會考論〉，《民國檔案》，2016 年第 4 期，頁 102-103。

⁵⁶ 胡克之，〈鎮江會員大會報告〉，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頁 81。

⁵⁷ 曹霄先，〈金壇支部周年概況〉，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頁 43。

稱其任職於自治會時，曾數次動念辭職，小島均「以忍字相勸勉」。胡任大民會支部長之後，又欲辭職，小島「復以忍字力勸」。⁵⁸由於胡克之與小島私交甚睦，大民會會務便得到了宣撫班的積極支持。

鎮江宣撫班為資助大民會，將鎮江火柴廠和麵粉廠的部分運銷權撥給了大民會。⁵⁹其中，火柴廠的運銷權完全為大民會和縣公署聯合壟斷。⁶⁰為此，大民會鎮江聯部於 1939 年 3 月 1 日成立運銷合作社，專事售賣麵粉和火柴，並稱該社的營業目的是「注重於大民會經臨費之不足，欲有以補助之也」，規定盈利的一半用於補助大民會鎮江聯部。由於麵粉係重要糧食，3 個月以後便由鎮江宣撫班直接統制。此後，運銷合作社以銷售火柴為大宗，為此招募了 20 個加盟零售商。⁶¹其中，運銷合作社每月直銷火柴 300 箱，其餘的 870 箱分給零售商銷售。1939 年 3 月至 6 月，運銷合作社營利 1,000 餘元，發付大民會 500 元。合作社的營利，加上鎮江宣撫班的補助，使得鎮江聯部每月經費達到 5,800 元，而其中只有 700 元由大民會總本部發放。⁶²利用這筆錢，大民會鎮江聯部開辦了物證借貸所和診療所。其他如蘇州、蚌埠、安慶等聯合支部，全靠大民會總本部每月發放的 500 元來維持，活動難以開展。

物證借貸所鑒於「求借貸既日繁有徒，無保者礙難告貸」，規定貧民不須覓保，「有物即可質錢，限期 8 個月，息定為 1 分，此外不取分文，到期贖物」，實際就是當舖。⁶³表 3 為物證借貸所 1939 年度收支報告表。根據表 3，該所 1939 年度總共收入利息 204.917 元，開支 2,056.018 元。利息收入尚不敷開支，

⁵⁸ 胡克之，〈送特務班員小島先生調武漢文〉，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頁 116-117。

⁵⁹ 鎮江麵粉廠於 1913 年成立，初名「貽成」麵粉廠，民營性質，是當時鎮江最大的民族企業。抗戰爆發後，該廠被租給日商新井洋行，至 1942 年被正式售予新井洋行，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糧食部作為敵產接收。參見〈鎮江麵粉廠概況〉，鎮江市檔案館藏，檔號 A023-1947-001-0375-0001。

⁶⁰ 〈資料 21·宣撫工作概況·鎮江班〉，收入井上久士主編，《中華宣撫工作資料》，頁 201。

⁶¹ 〈鎮江大民會運銷合作社近況〉，《新鎮報》，1939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

⁶² 〈一年來視察工作之彙述〉，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頁 9。本文此處所述貨幣單位應為法幣。

⁶³ 〈物證借貸所概況〉，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頁 53。

說明該所並非營利性質。實際上，借貸所本身的營運開支均由大民會鎮江聯部撥款，並不動用利息收入。由表 3 可見，該所全年貸出 15,340.5 元，這在戰時不是小數目。

表 3 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主辦物證借貸所 28 年度收支報告

| 月份 | 收進聯合支部款項 (元) | 每月貸出款 項(元) | 收回貸款數 目(元) | 收入利息 (元) | 開支數目 (元) |
|----|-----------------|---------------|---------------|-------------|-------------|
| 2 | 1,350 | 1,246.8 | 33.5 | 0.335 | 206.06 |
| 3 | 1,800 | 2,133.6 | 279 | 3.38 | 250.372 |
| 4 | 1,650 | 2,200.1 | 631.7 | 8.314 | 255.724 |
| 5 | 1,200 | 2,123.5 | 1,017.1 | 20.265 | 285.625 |
| 6 | 1,200 | 2,162.5 | 872.2 | 21.099 | 269.106 |
| 7 | 1,200 | 1,928.9 | 716.2 | 20.745 | 262.404 |
| 8 | 500 | 1,831.1 | 1,328.5 | 48.763 | 272.939 |
| 9 | .0 | 1,714 | 2,467.9 | 82.016 | 253.783 |
| 合計 | 8,900 | 15,340.5 | 7,246.1 | 204.917 | 2,056.018 |

資料來源：〈物證借貸所概況〉，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頁54。貨幣單位應為法幣。

診療所成立於 1939 年 5 月 2 日，配備醫生 1 人、藥劑師 1 人、看護 2 人、練習生 2 人及掛號員 2 人，設備及藥品均係免費。由於經費有限，診療所僅發給職員伙食費。從成立至當年 9 月底的半年間，該所共接診 1,890 人。其中，內科 216 人，外科 714 人，眼科 173 人，鼻科 64 人，喉科 78 人，花柳 117 人，急症 47 人，施診 481 人。患者的職業分布為，農民 280 人，工人 539 人，商人 389 人，學界 171 人，軍人 171 人，員警 163 人，幼童 177 人。⁶⁴從職業分布來看，工人、農民、商人患者最多。由於診療所是免費性質，吸引貧窮的農工階層及小本攤販前來就診，亦屬情理之中。

物證借貸所和診療所不可小覷的業務量，說明民眾對大民會給予的「實惠」是接受的。這一點在大民會檔案中也得到了印證，「民眾因受戰爭的影響，大

⁶⁴ 〈診療所概況〉，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頁 61-62。

多數陷於不能生活的狀態……他們的印象，很希望我們大民會來救濟呢」，⁶⁵甚而也有「民眾均紛紛來部請求散發米衣」等主動求助的情形。⁶⁶這一方面說明淪陷區民眾的生活困難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對淪陷區的下層百姓而言，迫在眉睫的是生存需求，故對日方當局的「救濟」是接受的。

然而，誠如上文所述，為謀生而做的妥協並不意味著精神上的認同。與大民會的「救濟」活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親日教育與宣傳活動，民眾對後者卻傾向消極抵制。以日語學社為例，該社起初招收學員 180 人，於 1939 年 1 月底開學，每日下午 6 時半至 7 時由謝世堃、洪德且、徐恆發、鮑慶和四人輪流教授日語，學制為 6 個月，免收學費。⁶⁷然而，6 個月的學習期限結束時，卻僅剩 29 人，絕大部分人早已中途輟學。日語學社沒有實現占領當局預期的「教化」目的。對此，胡克之認為這是「來學無誠意，很不好的」。⁶⁸此外，對占領當局舉行的各種宣傳大會，民眾也是敷衍應付。為給當局唱讚歌，大民會三天兩頭舉行宣傳大會，強迫民眾參加，做出粉飾太平的樣子，如「慶祝維新政府成立一周年紀念遊藝大會」、「鎮江民眾和平救國運動大會」等。據張懌伯的記載：

凡遇重要地方，如徐州、漢口、廣州陷落，又偽政府周年紀念，及天長節、日俄停戰紀念日等，鎮江即舉行慶祝大會。五色旗、太陽旗紛飛，遊行提燈，做出十分熱鬧（的樣子）。學生、工人、店員，固要一體參加，住家則由保甲長挨戶通知，每家派出一人，如不照行，即

⁶⁵ 〈大民會總部及上海市聯合支部關於洗落抗日標語及開展各項媚日宣傳活動的訓令〉，上海市浦東新區檔案館藏，檔號 35-1-010。

⁶⁶ 〈大民會上海市聯合支部第九次各支部聯席會議〉（1939 年 11 月 30 日），上海市浦東新區檔案館藏，檔號 36-1-010。

⁶⁷ 〈資料 21·宣撫工作概況·鎮江班〉，收入井上久士主編，《華中宣撫工作資料》，頁 202。四位日語教師姓名出自〈日語學社今日上課〉，《新鎮報》，1939 年 9 月 4 日，第 3 版，原文為「此屆除日語講師由謝、徐、洪、鮑四君講授外，並由國文陳講師轉授國文」。此外，表 1 也有四人姓名。

⁶⁸ 胡克之，〈鎮江聯合支部主辦鎮江民眾日語學社舉行第一屆學員畢業典禮〉，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頁 108。

照抗日論罪。所以每次遊行人數很多，全是用威力強迫來的。⁶⁹

大民會總本部顧問西村也覺察到了民眾的冷淡，他說：「我以前參加過很多支部成立大會，其中我感到在演說的時候，下面聽的人聽完了沒有一個人拍手，毫無一些表示。又如示威運動者，以及旁觀熱鬧的人，都不知道究竟開的是什麼會」。⁷⁰

或許是為給地方父老爭利，為此被迫向占領者妥協，或許僅為緩解附日行為帶來的社會責難，以胡克之為代表的鎮江上層在附日之後既不遺餘力的討好日本占領當局，為此不惜大力開展親日宣傳活動，同時也進行面向下層民眾的「救濟」活動。與此同時，下層民眾同樣存在糾結曖昧的情感。受求生動力的驅使，他們選擇接受占領當局的「救濟」，精神上卻游離於親日宣傳之外。

結 語

關於抗戰時期的親日問題研究，涉及道德判斷和事實判斷兩個層面。以往的研究往往將親日行為歸因於單一的道德因素，從而遮蔽了歷史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親日者的個人處境各不相同，親日動機也複雜多樣，當時的社會環境亦有別於今日，其間的豐富細節應得到更多關注。與其進行是非價值判定，不如致力於事實呈現。

在淪陷時期的鎮江，公私界限模糊的社會格局、現代國家觀念的相對缺失、淪陷區生活艱難的事實等等，共同促使了降日行為的發生，構成了淪陷時期鎮江社會的複雜面相。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⁷¹

⁶⁹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頁 55。

⁷⁰ 〈大民會聯合支部支部臨時聯合會議議案紀錄〉（1938 年 12 月 1 日），《新中國》，卷 1 期 5（1938 年 12 月），頁 69。

⁷¹ 在「差序格局」中，人們習慣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小圈子，依親疏關係向外推及。圈子範圍的大小依中心勢力的厚薄而定，有勢力的人家可以輻射方圓幾十里，窮苦家庭也許只限三五人。每個人的圈子大小不一，可伸可縮，於是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界限及權責關係相對模糊。例如，《大學》有一段話：「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在此，個人、家、國、天下都成了相對的概念，彼此之間的權責關係並不明確。見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39-48。

戰時的鎮江亦不例外。在「差序格局」裏，「公」與「私」是相對的，個人與團體之間權利義務的界定比較模糊。例如，在個人、家、國的關係中，家相對於國是「私」的，相對於個人則是「公」的，維護家庭利益既可說是顧私，同樣也可說是為公。因此，抗戰期間出現許多為家庭、為地方而捨棄民族大義的現象。胡克之、柳衍齋、郭志成等人自認降日行為是為保全鎮江，係出於公心，亦不是偶然。

由於其時國家尚未成為超越一切組織之上的絕對的公團體，個體在面臨外敵入侵時往往因其人生經歷、價值取向以及具體處境的差異而選擇了不同的效忠對象——國家、地方、個人，由此便導出或抵抗或妥協的不同行為。與此同時，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也漸漸傳入中國，無論是知識界還是政府當局，都有意塑造國民的愛國主義觀。因此，降日者極易陷入矛盾的處境。面對社會的道德責難，他們儘管行為上選擇了妥協，精神上卻自我懷疑，忌憚著「漢奸」的名聲。

地方上層尚缺乏民族國家觀念，謀生不易的下層民眾更慮不及此。生存是他們最大的難題。大民會的普通職員及會員多係鎮江中下層民眾，他們始因國民政府撤離而成為棄民，繼而因無錢逃難而被迫留在鎮江，只能設法維持生計。由於戰時生活艱難，他們只能選擇接受日方當局的「救濟」。對他們而言，入會或者不入會，入此會或者入彼會，都是為了生存。然而，許多跡象也表明，儘管下層民眾接受了「救濟」，但親睹地方淪亡及日軍暴行，他們對占領者的反感、對親日思想的抗拒亦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無論如何，他們最終選擇了生活。畢竟，淪陷不是末日，生活還將繼續。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大民會總部及上海市聯合支部關於徵集會員、頒發會證的訓令〉，上海市浦東新區檔案館藏，檔號 35-1-003。
- 〈大民會總部及上海市聯合支部關於洗落抗日標語及開展各項媚日宣傳活動的訓令〉，上海市浦東新區檔案館藏，檔號 35-1-010。
- 〈大民會上海市聯合支部第九次各支部聯席會議〉（1939年11月30日），上海市浦東新區檔案館藏，檔號 36-1-010。
- 〈鎮江麵粉廠概況〉，鎮江市檔案館藏，檔號 A023-1947-001-0375-0001。
- 《鎮江大照電氣公司創業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33年），鎮江市檔案館藏，檔號 C039-1950-002-0006-0001。

二、史料

- 〈大民會各聯合支部工作報告〉，《新中國》，卷1期4，1938年11月，頁54-62。
- 〈大民會聯合支部支部臨時聯合會議議案紀錄〉（1938年12月1日），《新中國》，卷1期5，1938年12月，頁66-74。
- 〈呈大總統呈明給予江蘇丹陽知事胡爲和獎章文並指令〉（1918年1月16日），《教育公報》，卷5期4，1918，頁58。
- 〈總本部工作報告〉，《大民會報》，期3，1939年3月，頁4-14。
- 《南京新報》，1938-1939。
- 《新鎮報》，1939-1940。
- 大民會出版部編，《大民會的任務》，南京：大民會總本部，1938。
- 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編印，《灌翁言論集》，鎮江：中國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1940。
- 井上久士主編，《華中宣撫工作資料》，東京：不二出版，1989。
- 特刊編纂委員會編，《大民會初周紀念特刊》，南京：大民會總本部，1939。
- 鎮江聯合支部編輯室編，《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初周紀念特刊》，鎮江：鎮江聯合支部，1939。
- 胡爲和，《新輯四書端目讀本》，鎮江：青雲門讀書樓，1934。
- 張懌伯著，鎮江市圖書館編，《鎮江淪陷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三、回憶資料

- 吉宗伯，〈兩度擔任丹陽知縣的胡爲和〉，丹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丹陽文史資料》，輯6，1988，頁87-88。

- 楊方益，〈鎮江商會始末〉，鎮江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鎮江文史資料》，輯 6，1983，頁 7-27。
- 楊方益，〈鎮江幫會見聞〉，鎮江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鎮江文史資料》，輯 8，1984，頁 46-67。
- 韓連綬、徐蔚如，〈丹陽原公園公共體育場簡介〉，丹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丹陽文史資料》，輯 4，1985，頁 115-119。

四、專著

- 卜正民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五、論文

- 王樹槐，〈江蘇省第一家民營電氣事業——鎮江大照電氣公司（1904-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下），1995 年 6 月，頁 523-526。
- 邵雍，〈大民會的來龍去脈〉，《檔案與史學》，2003 年第 6 期，頁 51-54。
- 劉潔，〈抗戰初期華東淪陷區偽組織大民會考論〉，《民國檔案》，2016 年第 4 期，頁 98-108。
-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下），1995 年 6 月，頁 815-841。
- Iriye, Akira.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54-274.

A Puppet Organization in Occupied East China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 Study of the Zhenjiang Branch of the Daminhui

Liu Jie*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37, East China was under invasion by the Japanese arm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resista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established a puppet organization named the Daminhui. The Zhenjiang branch of the Daminhui was founded in October 1938, and then dissolved in 1940. The Daminhui not only persuaded some local elites to join it, but it also attracted some members of the lower classes in Zhenjiang. However, the elites suffered from hesitation in choosing between collaboration and nationalism. The masses, on the other hand, accepted material relief from the puppet authorities to survive while resisting its colonial propaganda. The ambivalence of the collaborators toward the choice between morality and survival reveals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society of the occupied area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puppets, Daminhui, Zhenjiang, occupied areas,
Anti-Japanese War**

*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